

●理论特稿

新时代党的理论创新方法论中的问答逻辑

文/李平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六次集体学习时强调,推进理论体系化、学理化,是理论创新的内在要求和重要途径。逻辑是体系化、学理化的一个关键要素,问答逻辑是构建理论体系的一种基本方式,因为理论不是一系列命题的集合,任何反映时代精神的理论都是问题和答案的有机统一体。

马克思在青年时代就完成了从对理论的命题式理解向问答式理解的革命性转变。他在1842年指出:一个时代的迫切问题,有着和任何在内容上有根据的因而也是合理的问题共同的命运,主要的困难不是答案,而是问题。他在1843年给卢格的信中又说:虽然对于“从何处来”这个问题没有什么疑问,但是对于“往何处去”这个问题却很模糊。往何处去的问题是马克思一生致力于解答的总问题。马克思还专门讨论了“幻想”的问题,“提得非常错误”的问题,“本身就是抽象的产物”的问题等各种形式的伪问题,对这样的问题,唯一的答复应当是对问题本身的批判。离开了马克思致力于解答的问题,我们就无法真正理解马克思的思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历程就是不断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提出并解答新问题的历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蕴含着深刻的党的理论创新的方法论,这一方法论所蕴含的问答逻辑是马克思的问题辩证法在21世纪的最新发展。

坚持问题导向是马克思主义的鲜明特点

每一种真正的理论必有一个总问题,理论创新首先在于提出新的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理论创新只能从问题开始。从某种意义上说,理论创新的过程就是发现问题、筛选问题、研究问题、解决问题的过程。有问题才会思考,思考才有解决问题的思路方法,才有理论创新的可能。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坚持问题导向是马克思主义的鲜明特点。问题是创新的起点,也是创新的动力源。单从理论发展看,提出新问题有时可能比解决问题更重要,解决问题也许是实验上的技巧,而提出新问题则需要创造性和想象力。

问题是理论创新的源头,那何谓问题?毛泽东指出:什么叫问题?问题就是事物的矛盾。哪里有没有解决的矛盾,哪里就有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问题是事物矛盾的表现形式,我们强调增强问题意识,坚持问题导向,就是承认矛盾的普遍性、客观性。提出新问题,就是发现分析矛盾,抽象出矛盾双方对立的实质。抓住实质,就抓住了问题。

问题有真伪之别。真问题是现实生活中真实存在的矛盾,伪问题是虚构的矛盾。新时代的社会主要矛盾,是当前所面临的重要问题。这个问题的解答涉及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各方面的诸多具体问题。但“党大还是法大”的问题却是伪问题。对于伪问题的解答,就是批判

●问题探究

自觉主动担当新的文化使命

吴国富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指出:在新的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我们在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时代号召,充分展示出中国共产党高度的文化自觉和强烈的使命担当。从中华民族的新文化“到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化”,我们党始终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以强烈的历史自觉和主动精神走在时代前列,努力创造光耀时代和世界的中华文化,不断铸就中华文化新辉煌。

举旗定向中华民族的新文化

中国具有5000多年源远流长的文明历史,灿烂成就和深厚积淀,为人类文明进步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近代以来,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帝国主义文化与半殖民地半封建文化结成同盟,反对中国的新文化。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中国先进分子开始学习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指出:“中国人在精神上就由被动转入主动。从这时起,近代世界历史上那种看不起中国人,看不起中国文化的时代应当完结了。五四运动以后,中国产生了完全崭新的文化生力军,中国的无产阶级和中国共产党向着帝国主义文化和封建文化展开了英勇的进攻,致力于建立一个被新文化统治因而文明先进的中国,建立中华民族的新文化。”

中华民族的新文化是民族的,它反对

■ 党的每一次理论创新都是回答和解决人与社会面临的具有普遍意义的重大问题的创造性成果

■ 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的解答就是,以海纳百川的开放胸襟学习和借鉴人类社会一切优秀文明成果,在“人类知识的总和”中汲取优秀思想文化资源来创新和发展党的理论

■ 要从中国人民的创造性实践中总结经验,在从感性具体到思维抽象再到思维具体化的过程中,提炼出新的理论成果

■ 今日之中国,不仅是中国之中国,而且是亚洲之中国、世界之中国。中国问题的理论解答,本身就是解决人类共同问题的有机组成部分

问题本身,揭示其虚假性。作为理论创新起点的问题,只能是真问题。

真问题的地位是不平等的。有的是具有普遍意义的重大问题,有的是没有普遍意义的琐碎性问题。真问题地位的平等性源自矛盾的平衡性。马克思说:关于应该不应该在报纸上讨论哲学和宗教这个问题,由于问题本身毫无思想内容而被取消了。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为什么人的问题是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根本性、原则性问题。党的每一次理论创新都是回答和解决人与社会面临的具有普遍意义的重大问题的创造性成果。

正确回答时代和实践提出的重大问题

没有对重大问题的正确回答,也不可能具有真理性的重大成果。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就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等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原创性的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飞跃。

正确回答时代和实践提出的重大问题是方法论前提的,方法论上的前提有误,就只能南辕北辙。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中国共产党人深刻认识到,只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坚持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才能正确回答时代和实践提出的重大问题,才能始终保持马克思主义的蓬勃生机和旺盛活力。党的二十大报告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提出并阐述了“两个结合”、六个必须坚持等推进理论创新的科学方法,为继续推进党的理论创新提供了根本遵循。正确回答时代和实践提出的重大问题,必须坚守好马克思主义这个魂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个根脉。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坚守好这个魂和根,是理论创新的基础和前提。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立党立国、兴党兴国的根本指导思想,是我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

界的强大思想武器,是我们党的灵魂和旗帜,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和精华所在,是中华民族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根基。二者相互契合、相互激活,有效把马克思主义思想精髓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贯通,聚变为新的理论优势,才能在回答时代和实践提出的重大问题的过程中不断攀登新的思想高峰。

正确回答时代和实践提出的重大问题需要开放包容的胸襟。雍容大度、开放包容、博采众长是中华文明对待其他文明成果的基本态度。包容性是中华文明的一个突出特性,张骞出使西域、玄奘西天取经、郑和七下西洋等,都是自信开放的体现,中华文明在同其他文明的交流互鉴中不断焕发出强大生命力。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的解答就是,以海纳百川的开放胸襟学习和借鉴人类社会一切优秀文明成果,在“人类知识的总和”中汲取优秀思想文化资源来创新和发展党的理论。

中国的问题必须由中国人自己来解答

中国面临的问题,只有中国人最有发言权。一无所知的人不会提出任何问题,知之越深,提出的问题越准。问题是已经认识到的矛盾,并且想要解决这个矛盾。没有对矛盾双方的认识,就不可能有问题产生。认识到矛盾,但将矛盾认作理所当然,也不会提出相应的问题。任何现实的问题都蕴含着想要解答它的意志。问题在人的思维中是知识、意志和事物之矛盾的辩证综合体。因此,中国的问题只有中国人最清楚。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的问题必须从中国基本国情出发,由中国人自己来解答。中国的问题既要开放包容,也要自立自主,实现吸收外来与不忘本来的辩证综合。

解决中国的问题先要扎根中国大地。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解决中国的问题,提出解决人类问题的中国方案,要坚持中国人的世界观、方法论。不扎根中国大地,就难以真正理解中国人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就难以提出符合中国具体实际的解决方案。近代中国落后于西方,有人就食洋不化,总是不问国情、国策和民情,漠视各种具体条件,照搬西方理论的概念、范畴和命题,对活生生

需求成为新目标。此后,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手抓”都要硬,成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基本方针,党的十四届六中全会决议提出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党的十五大完整阐述了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建设纲领。

进入新世纪,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文化建设的中国特色和中国道路更加成熟。从党的十六大“文化建设和文化体制改革”战略部署,到党的十七大“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战略要求,再到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努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战略任务和“没有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发展,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重要论断,党始终重视并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人民理想信念和自信不断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和中华文化影响力大幅提升。

习近平指出:“道路问题是关系党的事业兴衰成败第一位的问题,道路就是党的生命。”在推动物质富足和精神富有的社会主义实践中,从“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历史自觉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全新命题,我们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开辟了一条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新路。

担当使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文化自信并将其与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并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四个自信。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他指出: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

阔的中国实践做“普罗克汝斯特斯之床”式的裁剪,个别外国人也试图在中国问题上发表一些脱离实际的说教。习近平指出:“在中国这样一个有着5000多年文明史、13亿多人口的大国推进改革发展,没有可以奉为金科玉律的教科书,也没有可以对中国人民颐指气使的教师爷。解答中国问题,要靠中国人自己从改革发展的实践中发现新问题、提出新观点、构建新理论。中国的问题不能靠背诵西方的理论词句来解答,也不能靠背诵马克思的具体词句来解答。习近平指出:我们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是要运用其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解决中国的问题,而不是要背诵和重复其具体结论和词句,更不能把马克思主义当成一成不变的教条。要从中国人民的创造性实践中总结经验,在从感性具体到思维抽象再到思维具体化的过程中,提炼出新的理论成果。”

为解答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贡献中国智慧

马克思主义是为人类求解放的思想体系,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也绝不是只专注于中国自身的理论。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狭隘视野,既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精神,也始终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深处的“天下大同”理想背道而驰。习近平强调:“中国共产党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党,也是为人类谋进步、为世界谋大同的党。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行动指南,也是世界思想史中的宝贵财富,为发展马克思主义作出了世界性贡献。”

中国离不开世界,世界也需要中国。今日之中国,不仅是中国之中国,而且是亚洲之中国、世界之中国。中国问题的理论解答,本身就是解决人类共同问题的有机组成部分。比如,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打赢了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脱贫攻坚战,为全球贫困治理和世界共同繁荣贡献了中国智慧。再如,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对于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具有示范、引领和借鉴意义,对科学社会主义也具有丰富、发展和辩证辩护。

党的创新理论不仅通过对中国之问的科学解答来为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作出贡献,还致力于直接解答“世界怎么了、我们怎么办”的世界之问。为破解全球“四大赤字”难题,习近平强调“坚持公正合理,破解治理赤字;坚持互商互谅,破解信任赤字;坚持同舟共济,破解和平赤字;坚持互利共赢,破解发展赤字。人类是一个命运共同体,世界是紧密相连的地球村,面对共同挑战,任何人任何国家都无法独善其身,人类只有和衷共济、和合共生这一条出路。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为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持续贡献着中国智慧、中国方案和中国力量。”

(作者系西南政法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本文系重庆市教育委员会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信念义务难题研究”[22SKGH004]成果)

泛、更深厚的自信。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建成文化强国宏伟目标,都提振了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底气。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首次提出的“人类文明新形态”和“两个结合”,彰显了高度的历史自觉和主动精神,为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注入了强大信心。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推进文化自信自强,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反映,同时又反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中国式现代化作为一种全新的人类文明形态深深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体现科学社会主义的先进本质,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和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代表人类文明进步的发展方向。

新时代是一个需要而且一定能够产生理论和思想的时代。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提出,标志着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规律的认识得到了新深化,历史自觉和文化自信再上新台阶,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征程上举起了新旗帜。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作为习近平文化思想的重要内容,为强国建设和民族复兴提供坚强思想保证、强大精神力量和有利文化条件。新时代新征程,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以更为强烈的历史自觉和主动精神,把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化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体实践,必能让中华民族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为人类文明发展进步作出新贡献。

(作者系四川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专题论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有深厚文化根基

崔华前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明确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强调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要求推动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天人合一、道法自然、贵和尚中”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蕴含的生态智慧,夯实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的深厚文化根基。

“天人合一”夯实了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的文化根基

中国古代贤哲提出“通天下一气耳”,认为“气”是化生万物的本原、构成万物的基本元素,并由万物同根同源、本质相同延展出“天人合一”主张。先秦时期,道家强调“以道观之,物无贵贱,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认为人与自然是一个相互平等、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儒家认为“天人同德”,倡导“以德配天”,追求“天人合德”。先秦以降,董仲舒提出“天人之际,合而为一”,“天人感应”等论断,认为人与自然外形相似、内在感通、有机统一,奠定了“大一统”的思想基础。北宋哲学家张载提出“天人合一”概念,强调“儒者则因明致诚,因诚致明,故天人合一”,主张“民吾同胞,物吾与也”,认为人与自然是一整体,大自然是人类的朋友。程颢提出“仁者浑然与物同体”,王阳明提出“天地万物本吾一体”,都主张“天人合一”。

“天人合一”思想彰显了中华民族的大格局、大视野、大情怀,蕴含人与自然相互影响、密不可分合理因素。马克思提出,“人靠自然界生活”,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恩格斯提出,“我们连同我们的肉、血和头脑都是属于自然界和存在于自然界之中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自然的看法与马克思、恩格斯的观点内在契合,对于克服天人对立的错误观点具有重要启发。习近平创造性赋予“天人合一”思想以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的时代内涵,分析了工业文明背景下传统工业化的迅猛发展加速了对自然资源的攫取,打破了地球生态系统原有的循环和平衡,造成人与自然关系紧张现状,必须克服把保护生态与发展生产力对立起来的传统思维,认为“人与自然是一种共生关系”,应该“共生共存”,强调“只有更好平衡人与自然的关系,维护生态系统平衡,才能守护绿水青山,倡导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同时要求科学处理保护环境与发展生产力、自然价值与自然利益、绿水青山与金山银山的辩证关系,注重保护生物多样性。”

“道法自然”夯实了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文化根基

中国古代贤哲主张,人类对自然环境的改造必须合乎自然之道。道家倡导“道法自然、无为而无不为”,认为“道”化生万物,但不强制万物,而是“以辅万物之自然而不敢为”,表现出自然无为的自信大度,从反面警醒人们“不知常,妄作凶”,“强梁者不得其死”,认为如果违背自然规律强作妄为,就会招致恶果。自然是指顺乎本然、自然而然;无为并非无所作为,而是非强制性、任性妄为。道家旨在倡导尊重自然、顺应自然。《易经》中说“财成天地之道,辅相天地之宜”,杂家提出“因性任物而莫不宜当”等,也都旨在倡导遵从和效法自然,不以人力干涉万物的自然生长。

道家思想彰显了中华民族顺天应人的价值理念,蕴含着尊重自然、遵循规律的合理因素。马克思提出,“不以伟大的自然规律为依据的人类计划,只会带来灾难”。恩格斯提出,“认识和正确运用自然规律”。道家“自然”与马克思、恩格斯的观点内在相通,对于解决违背规律、破坏自然而造成的生态失衡问题具有重要启示。习近平创造性赋予“道法自然”思想以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时代内涵,强调这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内在要求,引用“天不言而四时行,地不语而百物生”一语,倡导认识和遵循自然规律,合理利用,友好保护自然,警醒人们“只有尊重自然规律,才能有效防止在开发利用自然上走弯路,人类对大自然的伤害最终会伤及人类自身。”

“贵和尚中”夯实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文化根基

“和”是不同质的调和、多样性的统一、差异性的融合。中国古代贤哲把“和”视为万物生长的必要条件,提出“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万物各得其和以生,“高度肯定和贵的重大价值”,强调“和故百物皆兴,奉行‘和而不同’和为贵的价值准则。”和气生财、家和万事兴等脍炙人口的民间俗语,说明“贵和”价值取向在中华大地上已深入人心。为了实现“和”的理想,古人提出“尚中”方法论,“中”即不偏不倚。儒家认为“过犹不及”,提出“反过者动”出发,倡导“多言数穷,不如守中”。尚中与贵和相连,尚中是贵的内在要求,致和的根本途径,贵和是尚中的价值支撑,致和是尚中的理想目标,故而中国古代贤哲提出“中”和“范畴”,肯定“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尚中就要适度,懂得适可而止。中国古代贤哲把尚中原则运用于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提出“钓而不纲,弋不射宿”,反对“竭泽而渔”,主张“取之有度,用之有节”,要求“数罟不入洿池,斧斤以时入山林”,要让人与自然休养生息。

“贵和尚中”思想彰显了中华民族贵重的价值追求,蕴含着人与自然和谐相处、良性互动的合理因素。恩格斯提出,“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每走一步都要记住:我们决不像征服者统治异族人那样支配自然界。贵和尚中”与恩格斯的观点内在相融,对于推动人类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启示。习近平创造性赋予“贵和尚中”思想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时代内涵,引用“万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养以成”一语,生动阐明保护生物多样性、促进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性,引用“竭泽而渔,岂不获得?而明年无鱼;焚藪而田,岂不获得?而明年无兽”一语,警醒人们“过度开发也导致生物多样性减少,迫使野生动物迁徙,增加野生动物体内病原的扩散传播”,要求谋划经济社会发展必须站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度,为自然守住安全边界和底线,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格局,推进高质量发展必须认识到良好的生态环境是“人类生存与健康的基础、最公平的公共产品”,统筹推进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

(作者系温州医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教授,本文系浙江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2022年常规课题“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生物安全的重要论述研究”[22CCG29]成果)